

# 愛在未竟之時

——《不如歸》的基督教話語與跨語際傳播

## Love in Suspension: Christia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ingual Circulation of *Hototogisu* (The Cuckoo)

孫洛丹

SUN Luodan

### 作者簡介

孫洛丹，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SUN Luodan,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sunld100@nenu.edu.cn

## Abstract

Tokutomi Roka's novel *Hototogisu* garnered attention well beyond the literary sphere during the Meiji era, with its reading and dissemination constantly caught in the tension between privat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meaning.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close reading, study of publishing history, and cross-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ototogisu* does not continue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prevalent in Japan, where the emotional plot is concluded with a love-suicide; rather, under the multiple pressures of illness, war, and the family system, its response is to defer, interpret, and reposition individual suffering. By introducing a discourse of Christian ethics centered on the protagonist Ogawa Kyoko, the novel transforms "endurance" from a consequence of systemic oppression into a comprehensible ethical stance, thereby altering the mode of resolution for love narratives.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behind-the-scenes promoters" and the mechanisms of meaning reconstruction involved in the 1904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tory. It argues that it was precisely due to the commensurability of its emotional structure and ethical language that *Hototogisu* could gain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with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enter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as a realist text depicting "modern Japan".

**Keywords:** *Hototogisu*, Tokutomi Roka, Christian ethics, English translation

德富蘆花的小說《不如歸》自明治末年問世以來，被反覆閱讀、改寫與再生產，從報紙連載到單行本重版，從戲劇改編到跨媒介傳播，以不同文本形態持續流傳，常被視作理解近代日本通俗文學機制、情感敘事以及大眾閱讀心理的重要個案。<sup>①</sup>與此同時，它又較早被譯為外文，在日本現代小說對外譯介的歷史中佔據了一個醒目的位置。不僅如此，無論是在不同文本形態之間的流傳，還是在跨語境的傳播過程中，《不如歸》始終處在私人情感與公共意義之間的張力之中。

從故事層面看，《不如歸》描寫的是一段在婚姻、疾病與戰爭交錯中走向分離的愛情故事。陸軍中將片岡子爵的女兒浪子，與海軍中尉、男爵出身的川島武男結為夫婦，新婚不久，浪子便被診斷出患有肺結核。之後，在武男外出執行軍事任務期間，武男的母親強迫二人離婚，浪子離開夫家。甲午戰爭結束，武男歸來，浪子已因病去世。然而，若僅以“愛情悲劇”概括這部小說，會遮蔽《不如歸》最耐人尋味的敘事特徵：婚姻破裂、疾病侵蝕、戰爭阻隔，這段“苦難”疊滿、隨時可以走向殉情的愛情為何沒有被處理為殉情的“傳統”結局？相反，小說通過不斷延長分離與忍受的時間，使苦難成為日常生活必須承受的一部分。

當死亡不再作為情感的終極出口，苦難應當如何被理解與承受？《不如歸》並未通過情節上的和解或是命運的逆轉來回應這一問題，而是引入了一套並不總處於敘事中心、卻在關鍵情境中反覆顯影的倫理資源。本文關注的，正是小說如何在這段“未完成”的愛情敘事中，調用基督教話語，為苦難與忍受提供解釋的空間。小說中出現的宗教人物與宗教言說，並不直接推動情節發展，卻在關鍵節點介入敘事，

---

<sup>①</sup> Jonathan E. Zwicker, *Practices of the Sentimental Imagination: Melodrama, the Novel,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194.

為主人公的現實處境賦予意義，使“忍受”不再只是制度性壓迫的結果，而轉化為一種可以被理解的倫理立場。圍繞這一問題，本文將從文本細讀出發，考察基督教話語進入小說敘事的具體方式及功能，並進一步將視野延伸至作品的英譯與傳播實踐，分析這一倫理結構如何在跨語際語境中被識別、選擇並重新編碼，從而使《不如歸》在日俄戰爭爆發後作為一種關於“現代日本”的可信敘事進入英語世界。

—

《不如歸》之所以在明治末年迅速成為超級暢銷書，創下單行本問世十年間出版一百版的驚人記錄，並不僅僅因為其情節的傷感或敘事的緊湊，還有部分原因在於它講述了一樁公共視野中的現實事件，並且由於人物原型的“名流”身份，使得這部最初在《國民新聞》連載的小說具有了某種“吃瓜”的屬性。故事的原型即當時備受矚目的陸軍大將大山岩長女信子與其夫三島彌太郎的婚姻悲劇。信子於1893年成婚，當年冬季罹患肺結核，被迫轉地療養；翌年，三島家提出離婚，彌太郎亦在書信中請求信子“放棄”這段婚姻，1895年二人離婚，1896年信子病逝。圍繞《不如歸》的原型問題，既有研究多從事件對應的角度出發，將作品與大山信子離緣一事加以比照，考察小說在人物設置與情節結構上對現實事件的取捨與變形。<sup>①</sup>然而，若僅從事件與

<sup>①</sup> 相關研究如神田重幸：《〈不如歸〉（徳富蘆花）——夫婦愛，その理想と悲劇》，《國文學：解釈と鑑賞》，1987年第52卷第10期，第44-46頁；中村隆子：《小説〈不如歸〉に描かれた山川舍松》，《広島女子大國文》，1984年第1卷，第67-72頁；中村青史：《〈不如歸〉論》，《近代文學論集》，1988年第14卷，第9-15頁；閔肇：《メロドラマの時代—徳富蘆花〈不如歸〉の受容を軸として》，《京東光華女子大學研究紀要》，2006年第44卷，第29-70頁；郭勇：《“暢銷書”的策略：透視〈不如歸〉的帝國主義話語》，載《日語教育與日本學》，徐曙編，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3-102頁。[See Kanda Shigeyuki, “Hototogisu (Tokutomi Roka) — Conjugal Love: Its Ideal and Its Tragedy,” *Kokubungaku: Kaishaku to Kanshō* (Japanes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and Appreciation) 52, no. 10(1987): 44-46; Nakamura

其再現的層面理解這一過程，往往會忽略一個更為關鍵的中介環節，即小說的現實素材究竟是以何種方式進入文本？事實上這段豪門哀歌並非以未經處理的事實形態進入小說，而是以一種被講述、被高度情感化與倫理化的敘述方式進入作者的經驗世界。

蘆花本人在1909年小說發行百版之際，為公眾解密了創作緣起，事實上《不如歸》的構想並非源自對相關事件的調查或長期醞釀，而是產生於一次極為具體的口述情境之中。明治三十一年（1898）夏，蘆花夫婦在逗子避暑時，鄰室居住的福家安子向他們講述了大山信子因肺結核而被迫離婚、最終病逝的經過。<sup>①</sup> 福家安子的講述並非冷靜的轉陳事實，而是伴隨着哽咽、哭啼與強烈的情緒起伏，其中最令蘆花震動的，正是經由安子轉述信子臨終前遺言——“來生再也不做女人了”。蘆花回憶時，並未強調事件本身的戲劇性，而是反覆提及這句話在自己身體層面所引發的強烈反應，稱其“如電光一般掠過脊髓”。<sup>②</sup>

這句“來生再也不做女人了”，以極端的否定形式，將個人的不幸轉化為對女性整體命運的質疑。正是在這一瞬間，苦難不再只是某個家庭內部的遭遇，而被組織為一種可以被他人理解、並被反覆轉述的倫理語言。蘆花着意強調這句話在身體層面引發的震動，恰恰提示着我們，進入小說的，並非未經加工的事實或是調查後的發現，而是事實在被講述、被情感化和倫理化之後所形成的一種敘述方式與敘述

Takako, "Yamakawa Sutematsu in the Novel *Hototogisu*," *Hiroshima Joshi Daigaku Kokubun* (Hiroshima Women's University Journal of Japanese Literature)1 (1984): 67-72; Nakamura Seishi, "On *Hototogisu*," *Kindai bungaku ronshū*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14 (1988): 9-15; Seki Hajime, "The Age of Melodrama: On Tokutomi Roka's *Hototogisu*," *Research Bulletin of Kyoto Koka Women's University* 44 (2006): 29-70; GUO Yong, "The Strategy of the 'Bestseller': An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ist Discourse in *Hototogisu*," i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Japanese Studies*, ed. XU Shu (Shangha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2), 93-102.]

<sup>①</sup> 德富蘆花：《不如歸》，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第5-7頁。[Tokutomi Roka, *Hototogisu*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2), 5-7.]

<sup>②</sup> 同上，第6頁。

姿態。換言之，《不如歸》的現實基礎並不是某個可考據的“事件”，而是一個已經被倫理語言高度壓縮的情感瞬間。

值得注意的是，德富蘆花在回憶逗子夏夜那位講述“浪子之事”的婦人福家安子時——“她是一位三十四五歲、歷盡辛勞的人，（並非《不如歸》中那個小川某女），情感深摯，又極善言談。”——刻意用文中括號的方式補充此人“並非《不如歸》中小川某女之原型”。<sup>①</sup>此處澄清的“小川某女”實乃小川清子，出現在小說“下篇”。她並非故事主線中的角色，而是在浪子身心瀕臨極限、意欲投海自盡之際，將其救下的關鍵人物。此後，小川清子主動登門探訪浪子，在對話與陪伴中反覆引用《聖經》，並以自身的信仰經驗與身世經歷，為浪子所承受的苦難提供解釋與慰藉。由此反觀蘆花在序言中強調的“並非《不如歸》中那個小川某女”一語，其修辭功能恐怕不止於事實澄清。他在否認現實中的福家安子與小說人物之間直接對應關係<sup>②</sup>的同時，悖論式地凸顯出小川清子在小說中地位或曰功能的特殊。在《不如歸》的敘事結構中，小川清子的出現具有明顯的“異常性”。從情節推進的角度看，她既不創造新的衝突，也不改變事件的走向，她既不屬於促成浪子離婚的“聯盟”，也未參與戰爭、疾病或親族博弈等核心事件。然而，正是在這種非因果關係的位置上，小川清子短暫而集中地出現，被明確賦予姓名、社會身份與生活空間，在小說中承擔起一種不同於其他人物的“話語”功能。

從人物設定來看，小川清子並非一個抽象的“傳教者”或符號化的宗教代言。小說對她的身份與生活狀態有着相對具體的描寫，她居住在東京目黑一帶，長期收容並撫養多名孤女，她並非組織嚴密的教

<sup>①</sup> 同上，第5-6頁。

<sup>②</sup> 關於小說中小川清子這一女性形象與現實人物福家安子之間的可能關聯，學界雖尚無定論，但二者的經歷與背景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相似性。其一，福家安子為大山岩副官福家安定之妻，丈夫在甲午戰爭中戰死，小說中小川清子亦被設定為因戰爭失去丈夫的未亡人。其二，福家安子為基督教徒，小川清子在小說中同樣以基督教信仰者的身份出現。

會機構的工作人員，更接近以家庭形式運作的慈善共同體的一名參與者。小川清子並未被賦予明確的宗教權威身份，也未在文本中以佈道者的姿態出現，而是以日常照護者、傾聽者和引導者的形象存在，她既不屬於與浪子相關的親族網絡，也不代表國家或制度性的力量，卻在家庭倫理失效之際持續發揮作用。更值得關注的是，小川清子介入敘事的時機。她並非在浪子尚存希望、情感尚可修復之際出現，而是在主人公情緒與身體狀態瀕臨極限的節點被引入，浪子試圖以投海自盡的方式終結自身苦難，卻在這一瞬間被攔阻。小說並未詳細展開施救的過程，相反只是一筆帶過——“這時候後面呀的一聲，浪子被抱住了。”<sup>①</sup>後續敘事迅速轉為兩者關係的建立：小川清子登門拜訪浪子，並由此展開一段不改寫結局的交流。小川不承諾疾病的痊愈，也不試圖幫助浪子恢復其破碎的婚姻，更未對其家庭成員作出道德審判；她所做的，僅是為浪子提供一套能夠繼續“活下去”的倫理支持。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宗教語言第一次明確而密集地進入小說敘事。小川清子向浪子贈予《聖經》，卻並未將其作為必須遵循的信仰規範，而只是輕聲建議她在精神尚可之時“可以讀讀”。她隨即以自身經驗加以說明，“讀着讀着，彷彿山中迷路的人聽到了某處的鷄鳴聲，又彷彿漆黑的晚上從某處射來一道微光”。<sup>②</sup>這一比喻並未指向明確的終點或解答，而是強調在持續的黑暗中，仍然存在可以辨認方向的希望。此處並非對浪子的宗教勸化，也不是將信仰作為解決現實困境的手段，而是呈現出對苦難理解方式的微妙轉換。苦難不再被要求通過決斷、反抗或自我消滅來及時“解決”，也不要求被迅速遺忘，相反，小川試圖寬慰浪子的，是如何將苦難安放在一種可以反覆回望、逐段閱讀、緩慢承受的生活經驗之中。換言之，宗教語言所提供的不再是

---

<sup>①</sup> 德富蘆花：《不如歸》，豐子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第166頁。  
[Tokutomi Roka, *Hototogisu*, trans. FENG Zika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7), 166.]

<sup>②</sup> 同上，第176頁。

“信仰帶來救贖”的奇蹟敘事，而是與苦難共處、接受苦難為生活的一部分的意義框架。

這一機制在小川清子向浪子講述自身經歷（亦是信教經歷）中得到了進一步展開。小說用相當的篇幅呈現她的個人經歷：從武家出身到母亡父頹，從婚姻中的忍耐到維新動盪中的流離，再到戰爭帶來的丈夫之死與喪子之痛。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並未在她的人生中以先驗信念的形式出現，而是在一切崩塌之後，以一種幾近偶然的方式重新進入——在亡子遺物中發現《聖經》，“有些句子微妙地打動我的心弦”，<sup>①</sup>繼而通過耶穌教會學校的人際關係逐步確立信仰。通過對小川皈依路徑的再現，小說將基督教置於明治日本的現實語境之中，使其不再只是外來的思想資源，而成為在戰爭發生、家庭解體與女性生存危機之後仍可繼續生活的倫理實踐。由此可見，小川清子並非為了引入“宗教色彩”而被設置的裝飾性人物，而是小說敘事結構中的一個關鍵裝置。她使得前文所討論的那種經由口述而生成的敘述姿態，在文本中獲得了穩定的角色支撐，現實中福家安子以哽咽方式講述的絕望語言，在小說內部被重新組織為一種自然出現、持續發揮作用的敘事語調。通過這一人物，小說為苦難提供了一個不依附於家庭、不依賴於愛情、也不訴諸極端死亡的可能空間。由此，小川清子是否具有明確可考的現實原型已經不再重要，而關鍵在於這個人物在文本中所承擔的中介功能，她既不是問題解決者，也不是衝突製造者，而是將“無法善終的愛情”重新安置為“必須承受的生活”的敘事機制。

這一敘事選擇，與其說是情節層面的權宜安排，不如說源自作者一貫的思想取向。作為明治時期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作家，德富蘆花的文學實踐始終與其個人的精神經驗緊密交織。既有研究多指出，德富蘆花的基督教經驗並不表現為對教會制度或教義體系的系統闡

---

<sup>①</sup>同上。

述，而更接近一種內化於個體生活與文學實踐之中的倫理感受方式，尤其體現在其對苦難、承受與主體責任的理解上。這種經驗並未以理論化的形式進入作品，而是滲透在人物所處的具體情境、敘事節奏的時間變形以及反覆出現的語言語調之中，間接塑造了小說的價值取向。<sup>①</sup>從這一角度回看《不如歸》，宗教話語的介入並未試圖為婚姻、疾病或戰爭提供新的出路，而是承認這些處境本身的不可改變，並在此基礎上重新調整敘事的重心——人物如何在無解的現實之中繼續生活。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小川清子所承載的並非單純的情節功能，而是一種尚未被充分展開的倫理可能性。她所代表的宗教話語在小說中並未形成完整而自足的倫理體系，卻已開始鬆動既有的愛情完成邏輯，使“未竟的愛情”不再只能通向死亡，而被轉寫為一種必須延續、也無法迴避的生活狀態。

## 二

在日本近世以來的愛情敘事傳統中，殉情（日語寫作“情死”）並非單純的極端情感表現，而是一種被高度程式化、並指認為“情感完成”的敘事形式。<sup>②</sup>在近松門左衛門的淨琉璃作品中，男女可以通過“死”在彼岸世界獲得超越現世、酣暢淋漓的性愛合體；在江戶後期

---

<sup>①</sup> 相關研究如細見典子：《德富蘆花の初期作品考察—〈自然三部作〉の成立背景と作品世界を中心に》，濟州大學校大學院2015年博士學位論文；吉田正信：《德富蘆花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その前半生をめぐって》，《愛知教育大學大學院國語研究》，2006年第14期，第1-13頁。[Hosomi Noriko, “A Study of Tokutomi Roka’s Early Works: Focusing on the Background and Fictional World of the *Nature Trilogy*” (PhD diss., Jeju National University, 2015); Yoshida Masanobu, “Christianity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Tokutomi Roka: With a Focus on the First Half of His Life,” *Journal of Japanese Research, Graduate School of Aich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4(2006): 1-13.]

<sup>②</sup> 關於日本文學中的殉情敘事可參考邦光史郎：《情死の歴史：陰の日本史》，東京：日本書籍株式會社，1980年。[Kunimitsu Shirō, *The History of Love Suicides: The Hidden History of Japan* (Tokyo: Nihon Shoseki, 1980).]

流行的“心中”<sup>①</sup>物語裏，當現實無法容納一段情感時，死亡便承擔起“善後”的功能。而殉情之所以能夠在日本文學傳統中被反覆講述、並被觀眾與讀者理解為“愛情的完成”，並不取決於情感的激烈程度，而在於它依託着一套相對穩定的倫理前提和社會條件：其一，私人情感尚未被徹底納入國家與制度的治理視野，情感仍保有某種“不可控性”；其二，死亡被允許作為一種超越現實秩序的極端選擇，而非必須訴諸醫學或法理解釋；其三，殉情行為本身能夠在宗教想像、審美形式與共同體情感中獲得象徵性的承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死亡並非情感的失敗，而恰恰成為標誌其完成的“高光”時刻。<sup>②</sup>

進入明治之後，殉情並未立刻從文學作品中消失，它在報紙小說、情節劇與大眾讀物中依然出現，並以更加感傷化、視覺化的形式延續着近世以來的情感敘事傳統。但與此同時，支撐殉情成立的社會與倫理條件卻發生了根本性的鬆動。國家體制的集中化，使個體死亡被納入公共秩序的解釋框架；家庭制度的重組與再編，使婚姻與女性身體被明確安置進血統、責任與管理體系之內；醫學話語的興起，將疾病與死亡從命運或情感問題，轉化為診斷、隔離與治理的對象。在此歷史語境中，死亡不再是情感主體可以自由調用的倫理出口，而越來越被界定為一種必須被說明、被干預的異常狀態。也正是在這一結構性轉變中，近代文學作品裏的殉情開始頻繁遭遇延宕與失敗，或被他人強行中斷。這種變化，並非源自作家對殉情所具有的“感情淨

---

<sup>①</sup> 在日語中，“心中”與“情死”都可指“殉情”，但表意側重有所區別。“情死”專指相愛的男女共同自殺；而“心中”除了戀人赴死，還可泛指家人等非戀愛關係的多人共死。此外，“心中”還可用於“無理心中”的情形，即在非合意狀態下將他人一並帶入死亡，暗含“同歸於盡”之意，“情死”沒有該義項。就“戀人殉情”而言，“心中”強調共赴死亡的共同性與事件性；而“情死”則是一種意義化、敘事化的命名方式，指向死亡背後的情感邏輯與倫理解釋。

<sup>②</sup> Saeki Junko, “Reconsidering Tanizaki Jun'ichirō's 'Love and Eroticism': Iro tradition and modern ren'ai in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Midwest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Literary Studies*, no. 5(1999): 6.

化”功能的否定，<sup>①</sup>而更接近一種敘事層面的“無法完成”，不是人物不再絕望，而是現實已經無法為這種完成方式提供合法的空間。換言之，在形式上，殉情仍被召喚，在結構上卻失去了成立的條件，只能以未遂、錯位或被阻止的形態出現。

小說中萬念俱灰的浪子試圖投海自盡的情節，顯然並非突兀之舉，而是殉情敘事在明治語境的一次典型再現，《不如歸》真正的“突兀”在於它讓殉情發生、但同時又拒絕其完成。浪子投海並未成為愛情的終點，相反，這一行為在敘事中被迅速中斷，殉情所預期承擔的“為愛正名”的倫理功能並未實現。正是在這一“未完成”的節點上，小說與近世以來的殉情敘事傳統產生了決定性的偏移。殉情無法實現，浪子的痛苦也並未減輕，她對自身命運的悲觀與否定甚至比近世殉情敘事更徹底，但她所面對的現實——家庭制度的壓力、醫學診斷的介入以及戰爭動員的背景——都使得死亡不再是純粹的個人選擇。從這一意義上說，《不如歸》並非站在殉情敘事傳統的對立面，而是準確地寫出了其在近代遭遇的結構性失效，即殉情仍然被渴望，卻越來越難以成立；死亡仍然被想像為一種完成方式，卻不斷被現實攔阻。於是，小說需要引入新的倫理資源，對“未完成的愛情”作出重新安置。基督教倫理與戰爭倫理，正是在殉情敘事失效後，分別介入並接管了原本由死亡承擔的意義角色——個體層面的承受與公共層面的封存。

在個體層面，如前所述，小說通過小川清子這一人物設置，引入了一套不同於情節因果推進的宗教倫理解方式。這一倫理並不訴求現實處境的改變，而是為人物提供了一種繼續生活的解釋框架，使愛情在不通向死亡的狀態中被保留，並轉化為必須承受的生活經驗。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宗教倫理始終被限制在個體層面，浪子並未因信仰獲得社會承認，婚姻亦未因此得以修復，其最終病亡更未被納入任何

---

<sup>①</sup> 佐伯順子：《愛欲日本》，韓秋韻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505頁。[Saeki Junko, *Aiyu Riben* (Eros in Japan), trans. HAN Qiuyun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6), 505.]

宗教意義的救贖敘事之中。基督教話語在《不如歸》中所起的作用，並非重塑既有社會結構，而只是對個體生命的一次暫時托舉。

與宗教倫理僅在個體層面發揮作用形成對照的，是小說在浪子死後迅速引入的戰爭倫理。作為海軍軍官的武男，其身份並未隨着感情悲劇的發生而被懸置，相反，浪子的死恰成為這位無法承受喪妻之痛的丈夫重新確認其軍人身份的契機。篇末武男掃墓的情節成就了小說意味深長的收束，它既承載了私人哀悼的情感，又不斷被戰爭話語打斷、標記並重新整合。甲午戰後凱旋而歸的武男去掃墓，在他到達浪子墓地之前，小說插入了一對與主線幾乎無關的母子，孩子的一句“這個叔叔也是海軍”<sup>①</sup>於無形中將武男從“失去妻子的丈夫”重新標識為“海軍士官”。來自他者的指認，使武男在進入私人哀悼之前，已被放置進公共視野之中。而當武男走到墓前，面對寫有“片岡浪子之墓”的墓碑，“像石頭一般肅立着”，“過了一會兒，他的嘴唇顫動了，嗚咽之聲從咬緊的牙齒間漏出來”，<sup>②</sup>在這種壓抑而非爆發的悲慟中，他回憶起二人甜蜜的過往。同樣又是孩子（浪子之弟）的呼喚——“爸爸，有人在這裏呢。”<sup>③</sup>——引出浪子之父片岡中將的登場。小說中的兩位男性人物在浪子死後第一次正面相對，並以“武男的手被緊緊地握住了”<sup>④</sup>的身體動作完成和解，而這一和解發生在墓地這一高度制度化、公共化的空間。中將所說的“浪兒雖然死了，我還是你的岳父”<sup>⑤</sup>是對二人關係的重新界定，武男被重新納入家族和國家所認可的男性序列之中，個人恩怨與情感在反覆強調戰爭背景的宏大敘事中烟消雲散：“武男，咱們一同回去，慢慢地把台灣的情形講給我聽聽吧！”<sup>⑥</sup>

<sup>①</sup> 德富蘆花：《不如歸》，第201頁。

<sup>②</sup> 同上，第202頁。

<sup>③</sup> 同上，第203頁。

<sup>④</sup> 同上，第204頁。

<sup>⑤</sup> 同上。

<sup>⑥</sup> 同上。

《不如歸》並未以某一種新的倫理範式簡單取代殉情傳統，而是在“情死”逐漸難以成立的近代語境中，通過不同倫理機制的分層運作，重新安置了“未完成的愛情”。在小說的敘事結構中，基督教倫理與戰爭倫理並非彼此競爭，而是有機作用於不同層面：前者主要介入個體生存層面，使人物在失去愛情、疾病纏身、前途堪憂的處境中仍被允許繼續活着；後者則作用於公共與制度層面，通過戰爭經驗、父權承認與國家秩序，為事件提供一種可被社會接受的結局。愛情由此被懸置於兩者之間，被拆分為“必須承受的生活”與“已經封存的往事”。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不如歸》完成了對殉情敘事傳統的轉捩，不是否定其情感強度，而是改變其完成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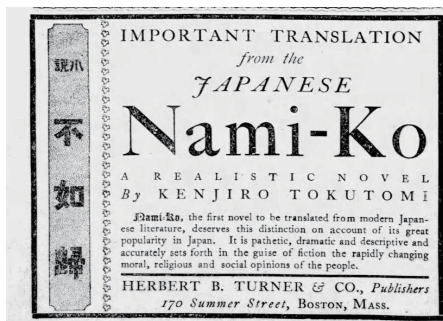
### 三

在日本文學史的既有敘述中，《不如歸》往往被認為是“最早被譯為英文的日本現代小說”，<sup>①</sup>這一事實似乎具有某種不言自明的合理性，作為明治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暢銷小說之一，《不如歸》在世紀之交被迅速譯介海外，彷彿只是文學影響力自然外溢的結果。然而，若將這一英譯事件重新置入其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不難發現，無論是譯介的時間點，還是文本選擇本身，都並非“水到渠成”，而是受到多重歷史條件的共同制約。

---

<sup>①</sup> 安藤義郎：《初めて歐米に紹介された日本の小説—不如歸とその英訳について—》，《經濟集志》，1976年第46卷別號（人文・自然科學編），第1頁；片岡真伊：《日本の小説の翻訳にまつわる特異な問題—文化の架橋者たちがみた“あいだ”》，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4年，第18-19頁。[Ando Yoshiro, “The First Japanese Novel Introduced to the West: *Hototogisu*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Economic Review of Nihon University* 46, *Special Issue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1976): 1; Kataoka Mai, *The Peculiar Problems Surrounding th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Novels: The “In-Between” Seen by Cultural Mediators* (Tokyo: Chuokoron Shinsha, 2024), 18-19.]

1904年4月初，英文《不如歸》以“浪子：一部現實主義小說（*Namiko: A Realistic Novel*）”之名在波士頓出版，譯者為耶魯大學的日本留學生鹽谷榮與《波士頓晚報》的編輯埃德溫·弗朗西斯·埃格特（*Edwin Francis Edgett*）。1904年4月2日英文版小說發行當日，《波士頓晚報》與《紐約時報》同時刊登廣告，為這部“來自日本的重要譯著（*IMPORTANT TRANSLATION from the JAPANESE*）”宣傳造勢，廣告正文指出，該小說“以虛構的形式，準確呈現了民眾在道德、宗教與社會觀念方面正在迅速發生的變化”。<sup>①</sup>在發行當日這一事前確定的時刻，如此措辭無疑表明《不如歸》並非作為一部僅供消遣的外國小說被引介，而是被明確定位為理解日本社會轉型的現實主義樣本。廣告文本由此構成了《不如歸》進入英語世界時的一次具有示範性的閱讀聲明——它預設並規範了讀者應當如何理解這部作品，也從側面印證了該小說在譯介之初，便被納入英語/基督教文化語境中關於道德、宗教與現代社會的解釋框架之內。



若從時間角度來看，日本文學“第一次”進入英語世界絕非發生在1904年。在此之前，日本古典文學已通過傳教士、外交官與東方學者的譯介，在歐美學界與知識界獲得了一定的關注度；在《不如歸》英

<sup>①</sup> 兩個報紙刊載的廣告內容和形式都是相同的，參見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April 2, 1904, 21;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04, 35.

譯前後，關於日本的非虛構作品，包括宗教、歷史、政治與民族性格的論述，在英語世界亦已形成相對穩定的出版類型。<sup>①</sup>換言之，英語讀者並非在1904年才“第一次”接觸日本，而是在一個已經積累了相當知識背景的前提下，開始提出新的閱讀需求：在急劇變化的國際局勢中，日本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現代國家？

而這種新的閱讀訴求與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密切相關。作為近代世界史上首次由亞洲新興國家戰勝西方老牌帝國的戰爭，日俄戰爭不僅在地緣政治層面引發震動，也在文化認知層面迫使英語世界重新思考“日本”的位置。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英語世界對於日本的興趣出現了結構性的轉變，從此以前以制度、文明論與民族精神為核心的宏觀敘述，轉向對日本社會內部生活形態的探詢。也正是在此語境中，一部小說（而非政治論著或戰爭紀實）開始顯現出其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即便在“需要一部小說”的前提下，文本的選擇也並不唯一。明治時代並不乏藝術完成度更高或者文學實驗性更強的小說作品，德富蘆花本人亦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確表達過對《不如歸》被率先譯介的不安與猶疑，認為其尚不足以代表日本文學的最高成就。<sup>②</sup>而《不如歸》之

---

<sup>①</sup> 此間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主題英文著作有Inazō Nitobe,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An Exposition of Japanese Thought* (Tokyo: Shōkwabō, 1900); Asakawa Kan'ichi, *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Its Causes and Issu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4); Okakura Kakuzō, *The Awakening of Japan*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905); Okakura Kakuzō, *The Book of Tea*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06); Lafcadio Hearn, *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4); W. Petrie Watson, *Japan, Aspects and Destinies*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4); George Waldo Browne, *Japan: The Place and the People* (Boston: Dana Estes & Company, 1904); James A. B. Scherer, *Japan Today*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04); George H. Rittner, *Impressions of Japan* (London: John Murray, 1904); Esther Singleton, trans. & ed., *Japan as Seen and Described by Famous Writers*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04).

<sup>②</sup> 德富蘆花，《蘆花全集 第二十卷 書翰集》，東京：新潮社，1930年，第140頁。[Tokutomi Roka, *Complete Works of Tokutomi Roka*, Vol. 20, *Collected Letters* (Tokyo: Shinchosha, 1930), 140.]

所以成為某種程度的“天選之子”恰恰在於其敘事結構與倫理主題具有高度可移植性，小說圍繞婚姻、家庭、疾病展開，其核心衝突並不依賴於日本特有的宗教儀式或歷史典故，而是建立在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情感結構之上。這種以私人生活為中心展開的敘事，使得小說得以被英語讀者理解為一幅“現代社會的日常圖景”，而非需要借助專門知識才能進入的異域文本。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不如歸》的英譯並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日本文學首次走向世界”的象徵性事件，而應視作一次具有明確指向的文化選擇。它回應的並非“日本文學應當如何被介紹”的問題，而是“在特定歷史時刻、甚麼樣的日本是可以並值得被理解的”。1904年，與其說是偶然地見證了一部小說的海外出版，不如說標誌着日本作為一個現代國家，開始通過文學這一形式，被納入英語世界的日常想像與道德判斷體系之中。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這部小說以何種方式進入英語世界的理解框架之中？在一個以新教文化為主導的閱讀環境中，外國小說的進入並不只是語言轉換的問題，而涉及其在道德與宗教層面是否具有可識別性與可信度。

1904年1月，蘆花在致美國出版商的信中表達了若將書名直譯為The Cuckoo無法傳達“不如歸”日語意涵的擔心，建議以女主人公的名字“Namiko（浪子）”作為英文標題。<sup>①</sup>這裏所涉及的，並非單純的語言對等問題，而是一次對不同文學傳統中“書名如何引導閱讀”的深思熟慮。日語中的“ほととぎす（Hototogisu，可寫作“不如歸”“時鳥”“子規”等）”原意指杜鵑鳥，因其鳴聲短促而淒厲，常常引發關於時令流逝、離別與生命不可逆轉的感受，由此在日本文學語境中逐漸承載起有關離別、流逝與人生無常的象徵性聯想。然而，這種以自然意象為中心、依賴文化記憶激活的象徵結構，在英語語境中並不具備相應

<sup>①</sup> 德富蘆花：《蘆花全集 第十九卷 偶感偶想》，東京：新潮社，1929年，第349頁。[Tokutomi Roka, *Complete Works of Tokutomi Roka*, Vol. 19, *Occasional Thoughts* (Tokyo: Shinchosha, 1929), 349.]

的情感與倫理共鳴點。不僅如此，以人物姓名作為書名，還是19世紀中期以來英語小說，尤其是現實主義小說中高度成熟、並為讀者所熟悉的一種命名方式。無論是《簡·愛》《安娜·卡列尼娜》，還是幾乎同期在美國引發廣泛討論的《嘉莉妹妹》，以女性人物命名書名，往往預示着一種以個體命運為敘事中心、通過私人生活展開社會與道德判斷的閱讀路徑。而修改小說標題的建議，可以理解為蘆花主動將英文版《不如歸》納入英語讀者已經具備閱讀經驗的現實主義譜系之中，讀者所面對的，不再是一個需要被反覆解釋的異域象徵，而是一個可以理解、可以同情、並據以展開倫理判斷的具體的人。因此，在從“杜鵑”到“Namiko”的轉變背後是一種針對潛在讀者閱讀經驗的校準，使小說自然地進入以個體命運、家庭關係與道德抉擇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敘事框架，並由此為作品在異文化語境中的可讀性與倫理層面的可理解奠定基礎。

此處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英譯本副標題的“一部現實主義小說（A Realistic Novel）”，其判斷依據從何而來？若將這一命名拉回當時的傳播語境，不難發現，“現實主義”並非源自對作品藝術風格的細緻分類，而是共生於英語世界對德富蘆花的輿論定位當中。美國報刊頻頻將蘆花稱為“來自東京的托爾斯泰（Tolstoy from Tokio）”，<sup>①</sup>這並非意在對其文學成就作出嚴格界定，而是一種具有明顯指向的輿論化命名。格溫多琳·J.布盧姆（Gwendolyn J. Blume）在考察世紀之交英語世界對托爾斯泰的接受時指出，在當時的英美印刷文化與評論語境中，“托爾斯泰”已不單是作家之名，而逐漸成為一種高度可識別的“讀者品牌”（reader-brand）：它在評論、廣告與出版實踐中被用來標示作品的嚴肅性、倫理關懷與道德現實主義立場。<sup>②</sup>“托爾斯泰式”小說通常被理解為以現實生活為對象，通過家庭、婚姻與信仰等私人

<sup>①</sup> *The Brooklyn Daily Eagle*, April 5, 1904, 8;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04, 18.

<sup>②</sup> Gwendolyn J. Blume, “The Reader-Brand: Tolstoy in Eng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53, no. 3(2011): 320-337.

領域的問題，展開對社會秩序與人性困境的道德審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將蘆花比附為“日本托爾斯泰”，為英語讀者提供了一種無需展開說明即可被理解的閱讀座標，使《不如歸》在進入英語世界之初，便被預先安置於一種兼具文學價值與道德嚴肅性的現實主義傳統之中。

然而，這一“現實主義”位置的確立，並非僅通過文本特徵或輿論比附自然完成，而是依賴具體的傳播機制與中介實踐。從現有材料來看，英文《不如歸》的出版，並非源自某位譯者的個人興趣或是出版機構的臨時推動，而是始於日本知識界對於“向外介紹日本小說”的討論與推動。1904年4月16日，《伯明翰新聞》（*The Birmingham News*）刊載的一則報道指出，最早向美國方面強烈建議翻譯德富蘆花《不如歸》的，是於1902年前後訪美的日本學者村井知至（Murai Tomoyoshi）與歷史學家村田勤（Murata Tsutomu）。<sup>①</sup>這一報道將英譯《不如歸》的動因明確指向日本一側的主動推薦，而不是英語世界對日本文學的有意發現。《伯明翰新聞》點名的村井知至與村田勤，並非偶然出現的日本人，而是出身於英語教育與基督教精神並重的同志社英語教育體系的一代知識人。村井早年受洗為基督教徒，後赴美留學，在神學與社會學領域接受訓練，並長期從事英語教育與思想傳播；村田勤則在同志社學習英語後赴耶魯大學深造，研習歷史學，並與德富蘆花保持着密切的私人交往。正是這一兼具英語能力、基督教倫理背景與跨文化經驗的知識構成，使他們能夠在特定歷史語境中，選擇《不如歸》而非其他小說走向英語世界。

前文所引蘆花致友人的書信，實為1903年寫給村田勤的私人通信。信中，蘆花對村田勤將自己介紹給美國出版界表達了由衷感謝，並對《不如歸》首先被推薦英譯表達出不安。蘆花的不安並非針對“翻譯”這一行為本身，而集中於作品在對外傳播中所承擔的“代表性”問

---

<sup>①</sup> *The Birmingham News*, April 16, 1904, 27.

題。他明確指出，《不如歸》尚不足以作為“近來日本小說之代表”，並主動推薦幸田露伴的《五重塔》、尾崎紅葉的《多情多恨》等作品，認為這些作品在文學完成度與藝術成熟度上更適合承擔對外展示的功能。<sup>①</sup>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這封書信並非揭示日本文學內部對英譯的分歧，而是再現了一場圍繞“如何系統性地向外輸出日本文學”的內部討論。蘆花作為作者本人，清醒地意識到英譯行為所具有的文化象徵意義，並試圖介入這一選擇過程，對“先譯甚麼”“以何種作品作為樣本”提出自己的判斷。

在作品被選定並賦予對外傳播意義之後，翻譯與出版的具體執行，則由分處不同位置的文化中介者接力完成。鹽谷榮作為在美學習英語戲劇的日本留學生，承擔了將原作轉化為英語文本的基礎性工作；而合譯者埃格特則在其晚年回憶中坦言，自己並不通曉日語，其所謂“合譯”主要是將鹽谷榮的日式英語整理為符合英語閱讀習慣的表達。<sup>②</sup>埃格特的回憶同時揭示了出版方最初的市場預期——鑒於1904年前後英語讀者正密切關注日俄戰爭的新聞報道，出版社曾寄望將《不如歸》作為“理解遠東局勢”的閱讀延伸，以激發書籍市場的興趣。然而，正如埃格特所言，這一判斷很快被證明是誤判，小說“甫一出版便告失敗”。<sup>③</sup>這一結果部分暴露出英譯《不如歸》在文學判斷、市場期待與時代語境之間所面臨的複雜張力。

從整體來看，《不如歸》的英譯並非沿着一條預先規劃、結構完備的跨國路徑展開，而更像是一系列在不同節點上不斷被接續的文化行動。其起點並不在英語世界，而首先發生在日本知識界之中，以同志社出身、兼具英語能力與基督教倫理背景的知識分子為主體，《不如歸》被識別為一種可以向外介紹的文學文本；隨後，經由在美留學

<sup>①</sup> 德富蘆花，《蘆花全集 第二十卷 書翰集》，第140頁。

<sup>②</sup> Edwin Francis Edgett, *I Speak for Myself: An Editor in His Worl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0), 220.

<sup>③</sup> Ibid.

生的翻譯實踐以及編輯協作，英譯本誕生，並最終通過報刊與出版體系進入公共閱讀空間。這一過程並未形成可被清晰勾勒、高度制度化的組織網絡，卻在目標和方向上展示出某種“一致性”——通過文學文本，使“現代日本”的社會倫理與日常生活獲得可被“世界”理解的表達與空間。波士頓作為當時美國重要的報刊與出版中心，同時也是日本相關社團與公共討論較為活躍的城市，為這一譯介行動提供了必要的輿論環境與制度條件。儘管受限於史料，目前尚難以完整復原這一跨太平洋聯繫的全部結構，但現有證據已足以表明，《不如歸》的英譯並非偶然的個人行為，而是日本知識界的主動判斷、跨文化中介的語言實踐以及英語媒體機制在特定歷史時刻聚合的產物。

1898年11月29日，《不如歸》開始在《國民新聞》上連載。與小說正文一同呈現在讀者眼前的，並非女主人公的肖像，也不是新婚夫婦的親密場景，而是一幅風景插圖——“伊香保八景”之一的“沼之杜若”。



這一圖像與小說中浪子與武男前往伊香保溫泉的情節形成了鬆散的呼應，卻並非對具體敘事場面的“寫生”。相反，它通過畫框這一明確的視覺邊界，提示讀者該圖源自對歌川廣重浮世繪名作的模仿與再加工。正是在這種並不新鮮、甚至帶有重複意味的視覺選擇中，《不如歸》被悄然安置進一條更為悠久的審美傳統之中。儘管它

常被視為一部描寫近代婚姻、個人情感與現實倫理衝突的“現代小說”，其最初的公共呈現方式，卻並未立即訴諸人物中心的現代視覺，而是通過對傳統風景圖像的挪用，使讀者仍然停留在

（上圖為小說在《國民新聞》第一期連載時的插圖；下圖為單行本的卷首插畫）

一種被歷史訓練過的觀看經驗之中。事實上，在《不如歸》長達半年的報紙連載過程中，幾乎期期配有插圖。

然而，在1900年1月民友社推出的單行本小說中，連載時期的插圖被全部刪去，取而代之的是由西洋畫家黑田清輝繪制的卷首插畫（日語寫作“口絵”，多為彩頁）“浪子像”。畫面以一位病弱的女性形象為中心，人物以半身側坐、目光低垂的姿態出現，呈現出明顯的內省狀態，而背景被處理為模糊而空曠的自然空間。與此前借助浮世繪傳統風景所形成的間接抒情不同，“浪子像”將視覺焦點明確集中在人物身上，使讀者在翻開單行本的瞬間，首先面對的是一個被凝視、同時等待被解釋的主體形象。這種以人物為中心、以寫生為方法的視覺策略，更接近一種現實主義的視覺倫理——不以營造情緒或者氛圍為目的，而重點在於確認人物處境與悲劇情境的現實性。通過這一媒介重組，《不如歸》逐漸擺脫了對傳統圖像資源的依賴，開始以文本自身作為主要的意義承載對象，完成了從“可觀看的小說”向“可閱讀的小說”的轉變。<sup>①</sup>

正如《不如歸》在視覺呈現方式上的變化，小說在敘事層面同樣經歷了一次深刻的重組。作品並未簡單延續以殉情為終點的傳統悲劇模式，而是在基督教倫理與國家道德話語的介入下，對個體苦難加以延宕、解釋與重新安置。死亡不再是情感的唯一出口，私人悲劇被納入一種可被理解與評判的新型倫理秩序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介入與“改寫”一方面保留了以抒情與情感強度為核心的敘事底色，使小說得以在與既有審美與情感傳統的連續性中被確認；而另一方面，對苦難的重新組織，又明顯指向一種以西方現代性為參照的敘事想像——無論是基督教倫理所提供的解釋框架，還是國家道德對私人情

<sup>①</sup> 권정희, 「신문연재소설에서 서적으로: 『호토토기스(不如歸)』의 매체 전환」, 『일본연구』 14, 2010, 230-234. [Kwon Jeong-hee, "From Newspaper Serialization to Book Form: The Media Transition of *Hototogisu*,"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no. 14 (2010): 230-234.]

感的重新定位，都使作品具備了對接西方現實主義敘事及其倫理結構的可能。也正因為此，《不如歸》在進入跨文化傳播語境時，得以被迅速識別並被量身打造為一種具有雙重取向的“現代日本”的文本凝結物：“日本”通過對傳統抒情資源的延續而得以顯影，而“現代”則在與西方的潛在對話中獲得規範與座標。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lume, Gwendolyn J. "The Reader-Brand: Tolstoy in Eng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53, no. 3(2011): 320-337.
- Edgett, Edwin Francis. *I Speak for Myself: An Editor in His Worl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0.
- Saeki, Junko. "Reconsidering Tanizaki Jun'ichirō's 'Love and Eroticism': Iro tradition and modern ren'ai in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Midwest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Literary Studies*, no. 5(1999): 2-17.
- Zwicker, J.E. *Practices of the Sentimental Imagination: Melodrama, the Novel,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 The Birmingham News*, April 16, 1904, 27.
-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April 2, 1904, 21.
- The Brooklyn Daily Eagle*, April 5, 1904, 8.
-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04, 35.
- \_\_\_\_\_ April 23, 1904, 18.

###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佐伯順子：《愛欲日本》，韓秋韻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Saeki, Junko. *Aiyu Riben* (Eros in Japan). Translated by HAN Qiuyun.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6.]
- 德富蘆花：《不如歸》，豐子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Tokutomi, Roka. *Hototogisu*. Translated by FENG Zika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7.]

### 日文文獻 [Works in Japanese]

- 安藤義郎：《初めて歐米に紹介された日本の小説—不如歸とその英訳について—》，《經濟集志》，1976年第46卷別號（人文・自然科學編），第1頁。[安藤義郎：《最早被介紹到歐美的日本小說——關於〈不如歸〉及其英譯》，《經濟集志》，1976年第46卷別號（人文・自然科學編），第1頁；Ando, Yoshiro. "Hajimete Ōbei ni Shōkai Sareta Nihon no Shōsetsu: *Hototogisu* to Sono Eiyaku ni Tsuite (The First Japanese Novel Introduced to the West: *Hototogisu*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Keizai Shushi* (The Economic Review of Nihon University) 46, *Special Issue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 (1976): 1.]
- 細見典子：《德富蘆花の初期作品考察—〈自然三部作〉の成立背景と作品世界を

- 中心に一》，濟州大學校大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細見典子：《德富蘆花的初期作品考察——以〈自然三部曲〉的成立背景與作品世界為中心》，濟州大學校大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Hosomi, Noriko. “Tokutomi Roka no Shoki Sakuhin Kō satsu: *Shizen Sanbusaku* no Seiritsu Haikei to Sakuhin Sekai o Chūshin ni (A Study of Tokutomi Roka’s Early Works: Focusing on the Background and Fictional World of the *Nature Trilogy*).” PhD diss., Jeju National University, 2015.]
- 片岡真伊：《日本の小説の翻訳にまつわる特異な問題—文化の架橋者たちがみた“あいだ”》，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4年。[片岡真伊：《日本小説翻譯所涉及的特殊問題——文化架橋者所看到的“之間”》，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4年；Kataoka, Mai. *Nihon no Shōsetsu no Hon'yaku ni Matsuwaru Tokui na Mondai: Bunka no Kakyōsha-tachi ga Mita “Aida”* (The Peculiar Problems Surrounding th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Novels: The “In-Between” Seen by Cultural Mediators). Tokyo: Chuokoron Shinsha, 2024.]
- 德富蘆花：《不如歸》，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德富蘆花：《不如歸》，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Tokutomi, Roka. *Hototogisu*.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2.]
- 德富蘆花：《蘆花全集 第十九卷 偶感偶想》，東京：新潮社，1929年。[德富蘆花：《蘆花全集 第十九卷 偶感偶想》，東京：新潮社，1929年；Tokutomi, Roka. *Roka Zenshū Dai Jūkyū-kan: Gūkan Gūsō* (Complete Works of Tokutomi Roka, Vol. 19, Occasional Thoughts). Tokyo: Shinchosha, 1929.]
- 德富蘆花：《蘆花全集 第二十卷 書翰集》，東京：新潮社，1930年。[德富蘆花，*蘆花全集 第二十卷 書翰集*，東京：新潮社，1930年；Tokutomi, Roka. *Roka Zenshū Dai Nijū-kan: Shokanshū* (Complete Works of Tokutomi Roka, Vol. 20, Collected Letters). Tokyo: Shinchosha, 1930.]
- 吉田正信：《德富蘆花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その前半生をめぐって》，《愛知教育大學大學院國語教育》，2006年第14期，第1-13頁。[吉田正信：《德富蘆花與基督教——圍繞其前半生》，《愛知教育大學大學院國語教育》，2006年第14期，第1-13頁；Yoshida, Masanobu. “Tokutomi Roka ni Okeru Kirisutokyō: Sono Zenhansei o Megutte (Christianity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Tokutomi Roka: With a Focus on the First Half of His Life).” *Aichi Kyōiku Daigaku Daigakuin Kokugo Kenkyū* (Journal of Japanese Research, Graduate School of Aich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4(2006): 1-13.]

### 韓文文獻 [Works in Korean]

- 권정희. 「신문연재소설에서 서적으로: 『호토토기스(不如歸)』의 매체 전환」, 『*일본연구*』 14, 2010, 230-234. [Kwon Jeong-hee. “From Newspaper Serialization to Book Form: The Media Transition of *Hototogisu*.”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no. 14 (2010): 230-234.]